

国学会心录

杨义 著

庚子三月王所
大德年十歲
歲次壬午
土山
車馬
生王
子
子

国学会心录

杨义 著



Copyright © 2014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会心录 / 杨义著. — 北京: 生活书店
出版有限公司, 2014.9

ISBN 978-7-80768-057-4

I. ①国… II. ①杨… III. ①国学—研究
IV. ① 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3785 号

责任编辑 廉 勇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常宁强

出版发行 **生活书店** 出版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2

字 数 265 千字

印 数 0,001 — 6,000 册

定 价 42.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7;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小 序

这个集子收录的二十余篇文字，是我近二十年来的短文、答问和一些讲演，多是随意而谈，随兴发挥，兴尽而止，少有拘束，家常话而已。这二十年类似的文字，粗算一下，有百余篇，选取与国学有关者，裒辑成册。

这二十年是我的学术大跨度转移的时期，在古今贯通，探究叙事学、诗学的基础上，兼及少数民族文学，并落脚于诸子学。因此我涉及的国学，是投入现代创新意识的，是“中学”，却又是“新学”，不像清末民初那样把国学等同于“旧学”。同时它又是大视野的，既是古今贯通，诗歌与小说、历史与思潮贯通，又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中国与外国贯通。所以我讲的国学，只能是“现代大国学”，国学是它的根基，现代是它的属性，大是它的模样。

我曾经说过，文章之结构，是人与天地之道签订的秘密契约。在全书的结构上，我把“现代大国学”一辑放在腰腹部，是气归丹田之处。在以答问方式谈了“现代大国学”与国学热以及“现代大国学”的内涵和魄力之后，选了四个具体的案例。《〈格萨尔〉千年纪念》彰显的是，国学不能只顾汉族而忘记少数民族、只顾文献传统而忽视源远流长的口头传统。《五四：一种新文化哲学的考察》，强调的是国学形态的现代转型，突出新的文化哲学。《鲁迅与

孔子沟通说》突出了国学形态之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一个关键，唯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才是大国气象。《钱锺书与现代中国学术》则推许“打通之学”，打通诗文、小说、杂著，打通文史哲宗教，打通中国与外国。“现代大国学”的形态、内涵和方法，也就蕴含其中了。

这股丹田之气贯穿全身，形成了有机的生命整体。“大国学术风范”为首辑，是全书的头脑，讲的是一个现代大国如何把握国学的方向、流程，及应具有的胸襟、魄力。“游弋子海”一辑居其次，对中国文化的源头水域进行巡阅，这是深入国学研究的根本，离开群经诸子，不足以言国学，因而这一辑是全书的心脏所在。“经典论要”一辑，是考察国学的流脉，由汉到清，绵延不绝，所辑包括汉、唐、宋、清，虽然不够丰厚，亦可窥豹一斑。再到“现代大国学”，这属于丹田之气的一辑，已是气脉打通，因而再来“精神谱系学”一辑，就进入文化血脉源流的考究了。古人重谱系，《唐六典》说：“谱系，以纪氏族继序。”郑樵《通志·氏族略》又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郑樵《通志》著录谱系凡六种一百七十部，都是家族血缘生长的大树。明人胡应麟《诗薮》云“古诗浩繁，作者至众。虽风格体裁，人以代异，支流原委，谱系具存”，已经把谱系树移植于文学领域。“治学路径”一辑殿后，自省是如何进入国学天地的，其中尤为强调“眼学、耳学、手学、脚学、心学”五学并用，探讨了国学与我的个性化问题。

会心，就是将国学的根系与自我之心对撞，迸发出生命的火花。“心热皆因火，花开不待春”，心有所感，不待时而发，因而没有正襟危坐的典重，少了装腔作势的刻板。我曾经说，对于经典，

应在以史解经的基础上，强化以礼解经、以生命解经，这个集子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以生命解经的操练，读者或能从中窥见我的一些思想的最初萌芽和它们的生长过程。

(2014 年 2 月 23 日)

目 录

小序 I

第一辑 大国学术风范

现代大国应对自己的文化深入还原 3

我是如何还原诸子的? 14

先秦诸子发生学 33

第二辑 游弋子海

《论语还原》的方法论效应 95

回到本来的孔子 119

庄子的鱼和老子的牙 132

借问庄子您是谁? 151

还原孙武子 162

第三辑 经典论要

《史记》论要 179

李杜论要 188

陆游：诗魂与越中山水魂 197

桐城派与“文章的清朝” 205

第四辑 现代大国学

国学热与建立“现代大国学” 211

“现代大国学”的内涵和魄力 222

《格萨尔》千年纪念 226

五四：一种新文化哲学的考察 232

鲁迅与孔子沟通说 240

钱锺书与现代中国学术 246

第五辑 精神谱系学

建造“中国心灵” 255

文学史研究与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 262

以大文学观重开现代文学史的新格局 267

元气：来自文化根脉的深处 288

第六辑 治学路径

给中国的文化或文学发一张现代身份证 295

聊以充数的治学经验谈 305

治学的五条路径 316

第一辑

大国学术
风范



现代大国应对自己的文化深入还原

一个现代大国需要对自己的文化经典进行还原研究，清理原始经典的知识发生的根源、思想者的文化生命基因、文本背后的文化意义密码以及诸多被历史烟尘遮蔽的千古之谜。要弄清自己的家底，激活这份深厚家底的文化生命，我们才能有根有据、底气深厚而又潇潇洒洒地开展新的文化创造。对自己家底做一个明白人，是莫大的幸运而快乐的事啊！连祖宗的遗产都是一笔糊涂账，时时聚讼纷纭，道不清一个子丑寅卯，又如何去说服别人呢？现代大国只有责无旁贷地应对自己的基本经典和文化伟人，给出一个原创性的、既根基牢靠又生趣盎然的说法，才能形成自己的最为根本的文化软实力。

还原就是寻找中国文化之原本，寻找它的思想力和生命力发生及存在的本真。还原，似乎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命题：一方面历史是不可能原原本本、百分之百地重新复原的，历史进入人们的记忆和记录，都是要经过筛选和叙说，这就要有所删除，有所聚光。不要说二三千年前的历史，就是昨日发生在另一房间的事情，你派人现场记录，再来向你复述的时候，已经不能丝毫不差、任何细节都不遗漏地重现出来。另一方面，还原又是非常必要，对于一个文化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虽然你不可能重现你被孕育的全部细节，但通过 DNA 的检测和分析，你还是可以指出你的亲生父母的。经

典是人书写和编纂的，那里蕴含着人的生命痕迹，可以追问著作者是谁，为何把书写成这个样子，其中的知识如何发生，思想如何被原创和接受。推求原始，辨析原委，走近诸子，触摸他们的体温，还原历史现场，是艰难的，但也是必要和具有可能性的。

我们应该重温刘知几《史通·书志篇》提到的两个掌故，其中说：“帝王苗裔，公侯子孙，余庆所钟，百世无绝。能言吾祖，郯子见师于孔公；不识其先，籍谈取消于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诸宗；楚置三闾，实掌王族。逮于晚叶，谱学尤烦。”中国人重视谱系学，不应仅限于家族谱系，更重要的是要弄清自己的文化谱系、精神谱系。孔子向东夷酋长郯子请教远古的文字记载之外的职官制度和图腾崇拜，打通了民族间隔，打通了文献传统和口头传统的间隔，并且发出“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的感慨。可见二十七岁的孔子问礼还原远古的礼制，采取了何种开放的胸襟。

另一个反面的掌故，发生在此前两年，《左传》鲁昭公十五年（公元前527年）记载：这年的十二月，晋国的荀跖去洛阳，参加穆后的葬礼，籍谈作为副使。葬礼完后，周景王以鲁国进贡的酒壶斟酒，宴请晋国的使臣。宴席间，周景王问籍谈：诸侯都有礼器进贡王室，为何独独晋国没有？籍谈回答：“诸侯受封，都在王室接受明器的赏赐，用来镇抚社稷，所以能够把彝器进贡给天子。晋国居住在深山，与戎狄为邻，远离王室。天子的赏赐达不到，拜见戎狄还来不及，又怎能进贡礼器？”周景王反问，你忘了晋国始祖唐叔是成王的同胞兄弟，受赏怎能没有份儿？并且列举了历朝赏赐给晋国的车马、斧钺、皮甲、香酒、弓箭，这些都是晋国要记录在册，用来彰显荣耀、教育子孙的。籍氏是因官职得姓氏的，从你的九世祖以来，就管理晋国的典籍，作为籍氏子孙，为何连这些都忘了呢？客人离开后，周景王说：这就是“数典忘祖”。这里涉及封

建制度、赏赐制度、进贡制度、丧礼制度、书籍制度，作为籍氏后人竟然忘记了掌管的典籍，忘记了典籍背后的祖先。这与孔子的文化旨趣绝然相反，孔子倡导“礼失而求诸野”，在这“失”与“求”之间，是要聚合各种生命痕迹、缀合各种文化碎片，以还原文化的根本的。

正是基于这么一种文化思路，我近年潜心于“先秦诸子还原”研究。其旨趣，就是要在文本、生命、文献、民俗、考古等多个学术维度上追求一种学术境界，透视诸子创造学说的生命过程，对诸子学说进行文化基因的分析，以疏通中华民族在其思想文化史上生长起来的文化精神脉络。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在诸子学研究中，一些文献根柢相当好的学者，经常忽略了文献之中、典籍之中蕴含着的著作者的生命。这种生命，使典籍得以发生；对这种生命的寻求和激活，又使古今可以进行对话，古今可以共享智慧。《礼记》记载，孔子临终对子贡说：“丘，殷人也。”这是追述和强调他的祖籍在宋，是殷人后裔。既然孔子这样强调了，弟子对孔子的丧葬就要按照殷礼实行。众弟子在孔子墓前庐墓守心孝，就是仿照商朝初年太甲到成汤、太丁在桐宫的墓地庐墓守孝的殷人丧葬之礼来执行的。集体守孝，奏乐成礼，斋戒祭祀，孝心互相感应，夫子的音容笑貌出现在面前，并与弟子对话，这就是“祭如在”。以礼解经，就会发现，《论语》材料的最初回忆记录，就发生在庐墓守心孝的三年（二十五月）的历史现场。如果众弟子分散前的这二十个月，不对夫子进行深切的追思和编纂追思录，那么对于事师如事父的弟子而言，又怎么面对孔子反复对他们讲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呢？这就印证了汉儒所讲，《论语》第一次编纂发生在“夫子既卒”（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的时候，如《汉书·艺文志》所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

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以礼解经，就是以当时士人行为规范来把握他们的办事方式，它应该与以史解经、以生命解经相互配置。由此又可以推导出《论语》第二次编纂，发生在庐墓守心孝结束，子夏、子张、子游推举有若主持儒门（鲁哀公十八年，公元前477年）的很短时间内，这在《论语》文本中留下足够的生命痕迹；第三次编纂发生在曾子死（鲁悼公三十五年，公元前432年）后不久，这是柳宗元在《论语辨》中考证出来的，宋儒程朱辈也认同这个说法，《论语》文本中也留下足够的生命痕迹。第一次编纂的主持者，据郑玄说，是仲弓、子游、子夏，这条线索经过荀子，通向汉儒；第三次编纂的主持者是子思及乐正子春等曾门弟子，这条线索经过孟子，通向宋儒。二千年儒学的汉、宋两大学派，在《论语》于春秋战国之际五十余年间的三次编纂中，埋下了它们最初的源头。

这也告诉我们，东周秦汉的书籍制度与宋以后的刻本制度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它往往不是一次编成的，或先有一个祖本，然后在多次编纂中有所调整、有所增删；或组简传抄、单篇别行，抄录、口传、汇集、整理交叉进行，从而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学派的手中，形成了类乎考古学的“历史文化地层叠压”。研究者不应抓住后来叠加和扰乱某些痕迹，就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轻易地斥之为“伪书”；也不应由于记载很早，就忽略有晚出的材料掺入并叠加于其中。认真的态度，应该是细心辨析文本中的裂缝，各家记载的差异，材料沾染的飘尘，推究不限于真伪的多种可能性，究其发生，察其原委，从字里行间窥见生命的脉动。若要形容这种研究方式，当可用得上“披沙拣金，集腋成裘”八个字。《太平御览》卷八一引《岭表录异》，有唐末郑玘的《伤淘者》诗：

“披沙辛苦见伤怀，往往分毫望亦乖。力尽半年深水里，难全为一凤凰钗。”也就是说，这种在战国秦汉典籍中辨析“历史文化地层叠压”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

我常有一种感慨，在材料的缝隙中发现古人生命的存在，或者说“以迹求心”，是需要悟性，需要敏锐的眼光的；而某些科班训练却钝化了被训练者的悟性和眼光，把材料当成死材料，对其中蕴含着的生命脉动视而不见。在这一点上，有些学者简直不如一个破案的警察，一个有经验的警察看到入室盗窃者的一个脚印，如获至宝，知道上面隐藏着人的生命信息，从中可以分析出入窃者的年龄、身高、胖瘦、走路姿态，给破案提供八九不离十的参考。但是按照这些学者的方法，只要拿尺子量量脚印的方位和尺寸大小，就心满意足，觉得非常“实证”了。许多人读《史记》，连“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都不问一问老子仅是“周守藏室之史”，对于如此官阶，先秦的官方文字会把他的里籍记录得如此详细吗？《史记》记载那么多人，里籍记得最详细的，只有三个人，一是《本纪》中的刘邦，“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二是《世家》中的孔子，“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第三个就是《列传》中的老子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老子的详细里籍，应是司马迁二十岁远游所得，《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庀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他到过刘邦、孔子的故乡，而“过梁、楚以归”，是指他过大梁之墟，观秦引黄河水灌大梁而灭魏的遗迹，以及信陵君拜访岩穴隐士，不耻下交的城东之夷门；而又经过“楚”，按照他回洛阳、长安的路途计，这个楚只能是“陈楚”，即老子的家乡。

既然司马迁到过老子家乡，又公布了老子家族一直传到西汉

文、景之世的家谱，那么他对老子传的书写对象，是清楚的，并不像某些疑古者戴着有色眼镜说的，分不清老聃、老莱子、太史儋。司马迁是警惕有人将老聃混同于老莱子、太史儋，才把他们与老聃著书不同，游说秦君并非隐士，进行分别辨析。司马迁心里明白，老子就是在传记末了又强调的“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就是《太史公自序》说的“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韩非揣事情，循执理，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至于梁启超发现，老子传八代就到文、景之世，而年少于他的孔子传了十三世；尤其是老子之子李宗为“魏将”，如果按照周烈王于魏文侯四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承认魏、赵、韩为诸侯来算，距老子出生已经一百六七十年了，因此他的儿子无论如何是够不上的。新发现的唐朝墓碑中，有《唐右骁卫朔坡府故折冲都尉段公墓志铭》，其中记载：“公讳会，字志合，淄州邹平人也。其先颛顼之苗裔。盖李宗自周适晋，仕魏献子为将有功，赐邑封段干大夫。孙木，文侯之师，偃息藩于王室，因地命氏，遂立姓焉。”这块墓碑照顾到李宗够不上魏文侯，就把他为魏将的时间上推了百年左右，安置在魏献子执政晋国的时期（公元前514—前509年），这倒是对上榫卯了。

但是以下六代，又如何能够延展到文、景之世？问题在于老子出关隐居的时候，已是起码六七十岁的高龄，他的儿子辈是不可能把他抛下，出山应聘为将的；经过三四代之后，耐不得寂寞的后人出山求职，才在事理之中。细读《老子列传》，既然老子出关后“莫知其所终”，那么谁又能知道“盖老子有百六十岁，或言二百岁，以其修道养寿也”？如果抽掉插入的老莱子、太史儋两则材料，接下来的就是老子之子李宗为魏将。揆之情理，这个李宗实际上是老子的三四代孙，他出山后凭着何德何能被聘为魏将？最好